

我的高原 我的山

高海平 著

开灶做饭，就得推碾磨面；

有了米面，还得有柴禾煤炭。

有钢使在刀刃上，山洼的这片沃土全都长庄稼了。

灌木荆棘也识趣，纷纷退到山崖、沟畔等险峻之地。

庄稼在地垄上微笑，灌木在悬崖上哭泣。

到了收获季节，农人挥起锋利的镰刀，
把成熟的庄稼齐刷刷地收割了，庄稼在哭泣，灌木却在微笑。

当山崖上的灌木荆棘侥幸时，
孩子手中闪着寒光的斧头正在向其逼近。

我的高原 我的山

高海平 著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Group
全国百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高原 我的山 / 高海平著. -- 南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 2017.9
ISBN 978-7-5568-2902-6

I. ①我… II. ①高…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75991 号

我的高原 我的山

WODEGAOYUAN WODESHAN

责任编辑 敖登格日乐
封面设计 韩湛宁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
(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 75 号 330025)
www.21cccc.com cc21@163.net

出版人 张秋林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飞达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7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9 月第 1 次
开 本 170mm × 240mm 1/16
印 张 18
字 数 292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68-2902-6
定 价 38.00 元

赣版权登字: —04—2017—580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 0791-86524997

民俗视角下的乡土中国

张锐锋

日本作家川端康成的一篇小说《金琵琶》中，讲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故事，一个关于童年的故事：一群孩子打着纸糊的灯笼，在夏天的夜晚到田野里捉蝗虫。这些天生的美术家们在灯笼的纸盒子上开了许多小洞，有圆的、三角的、菱形的，还有树叶形的，还染了各种颜色，还写上了自己的名字。他们扔掉了商店里可以买到的毫无特色的灯笼，烛光只能透过这些挖开的花样小洞照射出来，在四周投射出各种不同的花样和色彩，夏天的草丛在一个个光斑中晃动，“孩子们蹲在河堤上，专心致志地搜索着虫声”。终于有一个孩子捉住了一个蝗虫，后来认出是个头更大、十分稀少的金琵琶，男孩子将这个珍贵的捕获物赠给了一个女孩子。可是谁也没有注意到，男孩子的灯笼上的名字正好映照在女孩子的胸脯上，而女孩子的名字同样映照在男孩子的身上……川端康成在结尾的时候说：“有朝一日……你自己压根儿就无从回忆起今宵你那美丽的灯笼的绿光在少女的胸脯上幻化出光的游戏吧”。事实上，多少美好的事情不仅会被遗忘，甚至在发生的时候都没有在意。

生活是粗糙的，我们更多的时候，所发生的不过是为了遗忘。生活本身是细密的，它的温馨很易于被宽大的筛子漏掉。但总有一些人有着非凡的细心，生活中很多被忽视的东西，没有逃过他们的眼睛，他们看到了，记住了，牢牢地将之收入自己的文字花园，使其获得了永恒的馨香。高海平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个。他的新书即将出版之际，我阅读了这些充满了激情的散文作品。记忆是价值的存储器。他的散文用质朴的语调从容不迫地讲述了自己的记忆，并将记忆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安顿在稳妥的座位上。童年时代的虫声仍然有着原来委婉的低鸣，灯笼里的烛光仍然发出微弱的光亮，草地上仍然闪耀着游移不定的光斑，一切仿佛是原

来的样子。他把这些川端康成式的具有丰富寓意的场景从记忆中挖掘出来，压入了文字，唤醒了我们在梦幻中一闪而过的东西。过去的许多部分可能已经忘却，可是“灵魂记住了”，或者已经是灵魂的必要组件了，就像钟表内部的齿轮转动隐藏在表壳里，我们仅仅从指针表示的时刻上，看不见真正所发生的事实。

他的散文中分成了几部分，但我更偏爱他所写的有关童年生活的内容。因为这些记忆是和他的村庄联系在一起的，每一个细节都是铭心刻骨的，就像叶片上的叶脉，已经成为生命养分的输送者，没有它们，树叶就会枯萎、凋谢。对于某个具体的事实来说，一个人在许多时候可能充当旁观者的角色，所看到的也许是他无关的东西，他的生命也缺少真正的介入感。但是你如果生活于某一个环境中，你所经历的每一个事件，都与你密切相关，它们都会转化为个体经验，并产生了塑造你的力量，你又怎能轻视它？你的成长、你的性格，你的一切，都留下了他的指痕，它参与了个体的塑造，它和你已经长成一体了，就像大树的年轮已经包含了它生长过程中的环境信息一样。高海平在写这些童年记忆的时候，显然更为专注，更为用心，似乎已经消失在时间里的东西，在他的散文中复活了，变得灵动而富有活力，朦胧的影子越来越清晰，最后一切都毫发毕见、栩栩如生。

他写《剃头过年》：“村里有个五年制的小学，来了个老师是我家的一个远房亲戚，我叫他姐夫，虽是同辈，年龄很大了，他的儿子只比我小几岁。姐夫的理发手艺特别高，什么样的头他都能理得很好。小学校就在我家跟前，我那时已经上中学了，平时没事时到学校去玩。姐夫就说，你的头发长了，我给你理吧。就在办公室中间摆上椅子，把门帘摘下来，围在我的脖子上”。也写了多少年后回村时与姐夫相遇的微妙心理：“好多年没见到这个远房的姐夫了，那还是我上大学的时候，有一年在乡间路上不期而遇。他当时已是乡里的教办主任了，听说他的儿子不争气没考上大学，威望多少有些下降，儿子的落榜对他打击很大。在路上碰上时，我主动叫姐夫，上去问寒问暖。姐夫的笑容很尴尬，决计不提我上大学的事，只是像忽然想到了一句话似的说，你现在的发型不如以前的好，以后也没机会给你理发了。”关键是他的笔下记录了那个物质匮乏时代的生活场景，现实和历史的对撞产生了强烈的反弹，命运和时代摩擦的灼痛，让我们感受到了无法消弭的时差。

在《拉火把》一文中，他把童年生活饶有趣味的帷幕拉开了，让我们看到的

是一场场戏剧。这些戏剧实际上是预先写好了剧本的，他们只是按照剧本上演就可以了：“拉火把往往是小孩儿的事，每每在年关将至时，就忙碌地开始干这对于我们来说最有意思的事了。学校已经放假，我们就三五成群地上山砍柴了。火把的柴禾不太讲究，老柴、嫩刺、蒿草都可以。找上一片柴禾多的山坡，用镢头一股脑地往下砍，连柴带蒿带刺全有了，把这堆柴禾搂到一起用绳子捆了，用镢把挑了。柴禾便像鸟窝一样，被我们背回了家。”实际上，他们的演出仅仅是前人所演出的戏剧的重演，一代代的童年都是相似的：“柴禾好拾，火把中重要的是要有松树枝或柏树枝。这两种常青树标志着一种高贵、庄重和威严。我们常常看到用这两种树枝编制的彩门说明了这一点。火把里加进这两种树枝，一方面可以避邪，再一个能增加火把的燃烧效果。松树和柏树中都有油脂，哗哗啦啦地助燃声确实很刺激。这两种树在家乡是极缺的，我们村子更是少得可怜。有数的几棵要么长在悬崖上，要么长在坟头上，这就愁坏了我们。”

这样的演出实际上已经是民俗的一部分，它用来烘托节日的气氛。它既有仪式感，也有戏剧所要求的对困难的克服。另一篇作品《开门炮》也是如此：“孩子们伸出被冬天凛冽的北风冻裂的小手从大人手中接过鞭炮，皴裂的小脸就会露出甜蜜的、挂着鼻涕的笑容。拿到鞭炮后，小心翼翼地把鞭炮一个个拆开来，绝对不会成串地去燃放，那样太浪费了，要一个个地慢慢燃放。年三十晚上，把拆开的小鞭炮放在炉台上利用炉火的温度焙干鞭炮，焙鞭炮时还得小心谨慎，一定要离炉口远一点，这是真正的易燃易爆危险品啊。”实际上，一切节日都是孩子们的，只有他们的童真配得上盛大的庆祝：“正月初一，孩子们手里拿着一根香，边走边燃放鞭炮玩，调皮的男孩子故意把点着的鞭炮扔到女孩子堆里，吓得女孩子赶紧逃开，男孩子就会很爽朗地大笑。男孩子还在一起比胆量，看敢不敢用手抓住炮来放。鞭炮的屁股上都有远离火药的空隙，燃放时轻轻捏住炮屁股是没任何危险的，这要看你有没有这个胆量。这时候自然不愿意当蒜松包，都会把鞭炮捏住来燃放的。当然不能说没有一点危险，就有个小孩被炸了眼睛。”甚至，一次放炮的意外，竟然将爷爷的耳朵震聋了，耳朵里只剩下一片鸟鸣声。快乐是有风险的，没有任何风险的刺激，节日的魅力就会打折扣。何况过年这样一年一度的节日是过去和未来的链接点，有着强烈的象征意味，是某种命运、梦想和时光的压缩。

为什么这些看起来毫无价值的童年往事具有这样大的魅力？以致于作者不断提起这些鸡毛蒜皮、零碎杂乱、似乎毫无章法的游戏？还有这些节日，是多么普通、多么司空见惯的节日？在当今的城市里，节日几乎一个接着一个，只要有一个名目，就可以出现一个节日——来自西方的、东方的、异域的、本土的，太多太多了。可是那些土得掉渣的节日以及节日里的游戏，却总是更易于被记住，并不断地出现在梦中？真正追寻这些问题的时候，就会发现它是如此深奥，甚至不可能找到最后的答案。它导致了认知的“地平线效应”，事物的复杂度超出了你的认知力。你的目光有一道不可逾越的屏障，它在某一个地方突然终止了，你即使不断向前走，好像越来越接近真相了，可是地平线还在那里。也就是说，故乡的魅力源于它的不可认知的属性，当你生活在其中的时候，你不知道它。当你远离它的时候，才试图接近它，却不知道越是接近，却感到了你离他越来越远了，认识的欲望越强烈，认识的距离感越大。

于是，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呈现”。就是将我们的记忆用双手托出水面。这既可以避免某种价值误判，也可以将深层空间预留给我们的想象和猜测。可以说，乡村是民族历史文化信息的记忆芯片，它用一个社会生命体存储了巨大的信息，它的记忆是用巨大的历史惯性驱动的，似乎并不是刻意为之，而是在不知不觉之中无为而治，它用尽可能缓慢的变化，吸收、消化来自远古的内容，转化为某种生活本能。它包含了历史文化的内在框架，它的看去呆滞、一成不变的生活，从某种神秘的历史形成的“结构”中不断散发着令我们迷恋的香气。

高海平的散文中，充满了对乡村生活的迷恋，这种迷恋不是体现在廉价的、盲目的抒情上，而是不断将乡村细节摆放在桌子上。他的潜台词就是：你看，它就是这样子，我经历过，我是见证者。他有着很强的记忆力，他几乎记得自己所经历的一切，每一个细节都历历在目。这既得益于他的天赋，也说明了童年时代的一个个事件对经验世界冲击的强度。

当然，他也看到了这种“结构”解体的危险，以及农耕乡村的没落。在《迎喜神》一文中，他写道：“大年初一，在老家是要迎神的。放鞭炮，点火把，烧香叩头，拜神，拜祖宗，是有讲究的；不像城里人什么也不懂，就知道时钟敲响12点后，一个劲地放鞭炮，震耳欲聋，连电视也无法再看——这几年连鞭炮也不让放了”，然后他栩栩如生地讲述了村庄里精通阴阳占卜的老善人的故事，很像赵树理笔下

的“二诸葛”形象，不过这个老善人比二诸葛更有权威，他的一举一动都受到村里人的关注：“村里人都听老善人家什么时候放鞭炮，就跟着什么时候放，认为这肯定是好时分，不会有错”，这样，“我家迎喜神，是以爷爷测算的时分为准。爷爷有个发黄的手抄小册子，专门记载着怎样选择黄道吉日和迎接喜神的口诀。一进入年关，爷爷就拿着那本又黄又破的小册子，一边看着，一边用手掐着，嘴里还要念叨着：子丑寅卯……活脱脱像个高人”。但是，随着这个老善人的寿终正寝，人们失去了榜样，爷爷奉为圣物的“发黄的小册子”，也被老鼠咬成了碎片，用来掐算时辰吉凶的宝典没有了，“村人各行其是，凭自己的感觉迎神了，鞭炮声从深夜响到清晨”，规则失去了，只留下了外在的形式感。

民俗的原型来自历史的自我压缩，它是记忆的压缩率的结果，事实被去除了，剩下了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结构，然而这结构依然需要一系列事实的渲染体现和仪式的组合集成。也许，它包含了历史文化密码的最优解，它是历史演进用不断的“试错法”不断逼近获得的近似值，它给了我们理解历史文化的观测和想象的角度——文化来源于历史，它的真相在历史中，它的本质是在时空中的选择：生活选择了符合自身的方式，并将这种方式一代代传递到现实中，并转化为民族性格的一部分。探讨的问题，可能是人类如何超越自己的偏见，以摆脱困境。比如说过年的祈福和一系列活动，包含了人们不断面对基本处境所产生的深沉愿望。

说实话，我十分喜欢高海平所描述的乡村篇目。比如他所写的《故里人物》，每一个人物都是一幅简笔画，让人想到了美国作家舍伍德的《小城畸人》。耷人、伯父、小三爸……都有各自不同的性格特点，乡村人的自尊和卑微、吃苦耐劳，匠人的自负和吝啬、小人物谋生的艰辛和悲剧命运，尤其是小三爸放羊的绝技和生活中的窝囊、不惜体力和勤劳，最后却只能在死后用冥婚的方式圆梦，他的结局和他的勤奋形成巨大反差，让人不禁黯然神伤、唏嘘不已。

高海平是善于书写自己记忆的散文家，他的记忆是如此的清晰，就像把一粒细小的芝麻放到显微镜下，能够让人看见微小种子表面的毛孔。他的写作中，含有关于家乡的民俗学知识，提供了乡村生存模式的生动喻象。他对家乡的一往情深，在作品中便显得淋漓尽致。也许其中包含了他写作的基本动力，没有这样热爱，就不可能激发深埋在记忆深处蕴含的巨大激情。尽管他在别处的见闻录也写得生动有趣，但我还是从这些作品中看出了他基于自己家乡记忆的影子。这些影

子和其他故事具有高度的重合性，记忆和理解发挥了作用，以至于其中的每一种叙述都呈现出某种同构关系。

高海平的家乡在山西的晋南一带，是古中国的发源地，他所写的一篇篇关于家乡的作品，描述的乃是乡土中国的内在状态。它包含了先祖们的选择、策略、经验、信仰、智慧凝结的生存图景，我们既被历史文化统治又不断挣扎，总是试图摆脱这种统治从而获得自由。既有顺从也有背叛。充满了矛盾和悖论的文化处境中，乡村代表着现实与历史的不断冲突和妥协，最终达致微妙的和解和平衡。它既是抒情的，田园牧歌式的，又是艰辛的，甚至是残酷的，足以唤醒我们的悲悯之情。乡村中发生的一切，都具有极强的象征意义。在写作中，高海平也同样显现了矛盾重重内心世界，暗影和光亮彼此作用，渲染出一个立体的文字堆垒的镜像。

我能够理解高海平对于家乡的复杂感情，他不是一个遥远的观望者，他曾和这个地方是融为一体的，他的体验既是真切的，又仿佛是在梦境中寻找蛛丝马迹。因为他离开家乡之后拥有了更大的坐标，他的视野扩大了，就像一只鹰在空中盘旋，地面上奔跑的目标，变得游移不定，仅仅是辽阔地面的一部分。他需要不断调整自己判断，调整自己俯冲的姿势和捕捉机会。他是一个善于讲故事的人，尤其是善于讲家乡的故事。他的散文中具有小说的叙事色彩，生动，画面感强，流畅，自然，娓娓道来，有着徐徐生气，在不动声色的背后，升起了热情的炊烟。如同茨威格在小说《夏日小故事》中所描述：“平日因夜间柔和的暖意很早就使我感到疲倦，今天却因血液中涌起的兴奋而消散。如果一个人遇到一桩奇事，或者把别人的经历一时当作自己的经历，就会这样”。重要的是，他的表情是沉静的，复杂的，似乎又意味深长——“我不知道，你是在微笑，还是在悲伤”。

（张锐锋 著名作家 系山西省作家协会党组成员、专职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散文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故乡情思

过年五题

剃头过年

民间谚语说，有钱没钱，剃头过年。可见过年是要剃头的，其意义主要在于图个吉利，图个新气。一年忙到头咋也得把自己收拾得干净点、利索点，置一身新衣裳，没钱的，新衣服可以省了，剃头是不能省的，这是老辈子的教导。因此，就可以看到进入年关后的理发店生意红火的不得了。师傅们一大早开门，一直忙到深夜。不过忙是忙，脸上还是荡漾着满意的笑容，别人剃头过年，他们落个钵满盆满。

记得小时候在乡间过年，剃头都成为一件难事，我最害怕的就是妈妈摁住我的脑袋，拿一把剃头刀子像削苹果似的一点点地给我剃头，那种痛苦至今想起来都浑身打颤呢。我的头发特别厚，而且还特别硬，大人就说，头发又厚又硬，长大了是个受苦的命，我也压根没想自己长大要享什么福。剃头是个技术活儿，不是谁的妈妈都能为自己的孩子剃的了头的。记得那年过年时伯父给他的大儿子剃头，可能是伯父的技术有限的原因，没有给老大不小的堂兄剃好头，堂兄就又哭又闹，惹得伯父火了，端起地上刚刚洗过头的大铁盆就在堂兄的脑袋上砸去，男人生了气实在太可怕了，铁盆在与堂兄的脑袋发生撞击后，铁盆破了，当然堂兄的脑袋也开花了。看到这一幕伯父也傻眼了，把破了的铁盆攥在手里呆呆地站在原地半天一动不动。

村里不时地会出现挑着一头热的剃头挑子走村串巷的剃头师傅，师傅把挑子往村口一撂，生火、磨刀，一会儿来剃头的排起了队。剃头也没几个钱，除了把剃下的头发拿走再给个三斤核桃二斤枣的就打发了。我们弟兄几个倒是没有去过这种摊子剃头，都是妈妈大包大揽。

小时候的头发感觉总是长得很快，没有多长时间就长了，妈妈就要剃。每次

剃头我都要撕心裂肺地惨叫，妈妈警告我：老实点别动弹，我拿的可是很快很快的刀子啊，你瞎动就把你的头割破了。我一听就一动不动地缩着个脑袋呲牙咧嘴发出咿咿的声音。有时候妈妈的剃刀并不快，实在是疼痛难忍，就要歪脑袋，一歪，剃刀的尖儿就把头皮划破了。妈妈就埋怨：看看，不让你动你偏动。然后赶紧在地上抓起一撮碎发敷在伤口处。剃刀剃出的发型很特别，上下发线分明，齐崭崭的，没有过渡，就是人们常说的盖儿头。其实，妈妈也不想给我们剃头，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看到我们每次剃头时痛苦的样子，她也难以下手。有时候索性用剪刀剪，剪头发是不疼的，可是不好看，跟狗咬了似的。那时候小，并不懂得外表形象多么重要，也落得开心。平常可以这样来打发一下，过年必须要剃一个干干净净的整齐的脑袋才行，过年嘛。

剃头在小时候印象深刻。后来村里有个年轻人买了一把理发推子，我们彻底从妈妈的剃刀下解放了出来。每次头发长了，妈妈给两毛钱到有推子的年轻人那里掏钱让人家来打理。推子理出来的发型果然漂亮，至少不是盖儿头了，明显精干了许多。村里的孩子们也慢慢从剃刀下逃离了出来，纷纷涌向有推子的年轻人家里。这个有经济头脑的年轻人不同于其他人，后来离开了村子到了城里工作和生活了——这是一句闲话。

村子里有了第一把理发推子，紧接着就有了第二把，第三把了。我爸爸也买了一把，我们弟兄几个自己学着使用，然后彼此给对方理发。爷爷看见这新鲜玩意不错，也让我们给他理。他很高兴，也不用每次剃头到村里找人了。妈妈把剃刀彻底的收了起来。

村里有个五年制的小学，来了个老师是我家的一个远房亲戚，我叫他姐夫，虽是同辈，年龄很大了，他的儿子只比我小几岁。姐夫的理发手艺特别高，什么样的头他都能理得很好。小学校就在我家跟前，我那时已经上中学了，平时没事时到学校去玩。姐夫就说，你的头发长了，我给你理吧。就在办公室中间摆上椅子，把门帘摘下来，围在我的脖子上。边忙着活计边不停地说：我的手艺肯定让你满意，公社主任的头都是让我理的。我在那又大又圆的脑袋上像摸西瓜一样地摸来摸去。公社主任那可是官呀，大官哩。他的脑袋也是由咱随便拨弄。姐夫手不停，嘴也不停。我发现他给别人理发比教书还能找到感觉。紧接着又说起他的儿子如何如何优秀，语文成绩从来都是名列前茅，特别是毛笔字写得好，每年过

年村里各家各户的春联都是出自儿子的手。关于他儿子的事迹我也有耳闻，确实不错。姐夫家离我们村不远，再说我们是亲戚嘛，总是知道一些情况的。不一会儿的功夫，我的发型出来了，果然不同一般。那时候好歹也是个中学生了，对自己的形象还是很在乎的，看见经姐夫打理的发型与众不同，心里很高兴，也就相信他所说的话。后来只要头发长了就到学校找姐夫，直到姐夫调走。

好多年没见到这个远房的姐夫了，那还是我上大学的时候，有一年在乡间路上不期而遇。他当时已是乡里的教办主任了，听说他的儿子不争气没考上大学，威望多少有些下降，儿子的落榜对他打击很大。在路上碰上时，我主动叫姐夫，上去问寒问暖。姐夫的笑容很尴尬，决计不提我上大学的事，只是像忽然想到了一句话似的说，你现在的发型不如以前的好，以后也没机会给你理发了。我的心好像被针刺了一下。

马上就要过年了，还是想起了那句老话，有钱没钱，剃头过年。急忙抽出时间上街理发去，好不容易等到个位子坐上去。却听到理发师傅说，先生，你的头发好稀少哦，还有白的了，头皮都快要露出来了，留长点还是短点儿，要不焗下油？

我顿时感到一种悲哀从心底涌出。

（原载于《山西文学》杂志）

拉火把

在老家过年是非常热闹红火的，大年初一除了贴春联、放鞭炮、吃饺子外，家家院里还要点上一堆火把。谁家的火堆大、火把旺，能燃起几丈高的火焰，谁家在这一年里光景红火、兴旺。

拉火把往往是小孩儿的事，每每在年关将至时，就忙碌地开始干这对于我们来说最有意思的事了。学校已经放假，我们就三五成群地上山砍柴了。火把的柴禾不太讲究，老柴、嫩刺、蒿草都可以。找上一片柴禾多的山坡，用镢头一股脑地往下砍，连柴带蒿带刺全有了，把这堆柴禾搂到一起用绳子捆了，用镢把挑了。柴禾便像鸟窝一样，被我们背回了家。

柴禾好拾，火把中最重要的是要有松树枝或柏树枝。这两种常青树标志着一种高贵、庄重和威严。我们常常看到用这两种树枝编制的彩门说明了这一点。火把里加进这两种树枝，一方面可以避邪，再一个能增加火把的燃烧效果。松树和柏树中都有油脂，哗哗啦啦地助燃声确实很刺激。这两种树在家乡是极缺的，我们村子更是少得可怜。有数的几棵要么长在悬崖上，要么长在坟头上，这就愁坏了我们。有几棵柏树倒是既不在悬崖上，也不在坟头上，上面的枝枝节节已经砍削无几了。那挺拔的树干只剩下了一个极小的绿顶子，活像小孩被妈妈用剃刀剃出的伞状脑袋壳。即使这样，我们有时也还得爬上去，哪怕砍上很少的几个枝叶，不往火把里放也得插在门上。

有一年，过完年没几天，村子里有个男子跑来告诉爸爸说，我家祖坟上的那棵小柏树被他家的孩子在年前拉火把时给拦腰砍断了。爸爸赶紧到坟头去看，果然，那棵已经栽植了十几个年头的柏树不见了。祖坟上就没有几棵像样的树，一棵柏树还被无知的顽童毁掉了。爸爸当时非常生气，毁了还能怎样，况且，家长亲自登门谢罪。有火不能发，有气不能出，事情就不了了之。

以后，每年到了年关拉火把的时候，爸爸就不让我们再砍柏树枝了，即使这样，也总要自然而然地想到我家坟头被砍掉的那棵柏树，如果还在的话就怎样怎样了，心里多少有些不愉快。

（原载于《三晋都市报》）

开门炮

小时候在农村过年，喜欢鞭炮远远胜过拥有一件新衣服。哪个小孩兜里不是装着一兜子的鞭炮啊！大人去集贸市场购置年货时，除了买大炮、小炮还要买小鞭炮。孩子们伸出被冬天凛冽的北风冻裂的小手从大人手中接过鞭炮，皴裂的小脸就会露出甜蜜的、挂着鼻涕的笑容。拿到鞭炮后，小心翼翼地把鞭炮一个个拆开来，绝对不会成串地去燃放，那样太浪费了，要一个个地慢慢燃放。年三十晚上，把拆开的小鞭炮放在炉台上利用炉火的温度焙干鞭炮，焙鞭炮时还得小心谨

慎，一定要离炉口远一点，这是真正的易燃易爆危险品啊。

村里有户人家因焙鞭炮时没放好，半夜时家里响起了连环炮声，村里人还以为是谁家迎接喜神呢。正月初一，孩子们手里拿着一根香，边走边燃放鞭炮玩，调皮的男孩子故意把点着的鞭炮扔到女孩子堆里，吓得女孩子赶紧逃开，男孩子就会很爽朗地大笑。男孩子还在一起比胆量，看敢不敢用手抓住炮来放。鞭炮的屁股上都有远离火药的空隙，燃放时轻轻捏住炮屁股是没任何危险的，这要看你有没有这个胆量。这时候自然不愿意当孬松包，都会把鞭炮捏住来燃放的。当然不能说没有一点危险，就有个小孩被炸了眼睛。

大年初一早上开门时要放开门炮。这是个很重要的讲究，用炮声驱赶小鬼恶魔，从而炸开一个红红火火的新年。开门炮都是由大人来放，一来是大人燃放显得郑重严肃不同凡响，二来是开门炮比较粗，引线短，来得特别急，动作不敏捷就会在手里爆炸，所以轻易不让小孩燃放。我和爷爷住一个屋，爷爷年龄很大了，开门炮由我来燃放，我怕炸了手，把炮放在门墩上。炮的声音不往外传，却往屋内蹿。睡在窗前的爷爷被毫无防备的炮声震蒙了，耳朵里混沌成一片鸟鸣声。从此，爷爷失去了听力。

我起先对此并不以为然，不认为爷爷的失聪和我那次燃放开门炮有关，爷爷一口咬定是被那次炮震聋的。爷爷的坚定使我慢慢地产生了一种负疚感，而且一直持续了很长时间，虽然爷爷离开我们已经很多年了。

我便对燃放鞭炮产生了畏惧，由扔在地下燃放，再到躲之唯恐不及。如今居住在城市里，听到的鞭炮声远远多于当年在村里的时候，如今的鞭炮声威力又远远大于当年。但愿人们能够在这轰轰烈烈的炮声中好运连连，炸开新的一年的财富之门！

（原载于《太原日报》）

迎喜神

大年初一，在老家是要迎神的。放鞭炮，点火把，烧香叩头，拜神，拜祖宗，是有讲究的；不像城里人什么也不懂，就知道时钟敲响 12 点后，一个劲地放鞭炮，震耳欲聋，连电视也无法再看——这几年连鞭炮也不让放了。迎神，就是把神从天宫中接到家里来，谁家能接到喜神，谁家就能一切顺利，心想事成，大吉大利……总之是福星高照，财源滚滚。

村庄有个老善人，对风水、阴阳颇有了解。村里人都听老善人家什么时候放鞭炮，就跟着什么时候放，认为这肯定是好时分，不会有错。我家迎喜神，是以爷爷测算的时分为准。爷爷有个发黄的手抄小册子，专门记载着怎样选择黄道吉日和迎接喜神的口诀。一进入年关，爷爷就拿着那本又黄又破的小册子，一边看着，一边用手掐着，嘴里还要念叨着：子丑寅卯……活脱脱像个高人。

有一年，爷爷提前几天告诉我们，大年初一迎喜神的时分是丑时，也就是半夜 1 点至 3 点。一再叮咛不能迟了，这是个吉辰，寅时就是凶煞了。搞得全家都紧张，我们弟兄几个，觉都睡不沉实，只怕误了。躺在炕上，爷爷的呼噜声不断，一会儿一觉，我们却睡不着。整个村庄静悄悄的，没有一丝动静。爷爷每睡醒一觉都要问一声，时分到了吗。我们终于告诉爷爷，时分到了。接着弟兄几个互相捅一捅，让赶快起床。这里面有个讲究，大年初一，起床时不能说“起”，一说“起”，这一年会遇上蝎子蛰，蚰蜒咬，那是非常痛苦的事。只能用手语表示或者说上一句：“穿衣服”。

一家子忙忙碌碌，点火把的点火把，放鞭炮的放鞭炮，烧香的烧香，叩头的叩头。祭神拜祖，总算忙完了。这时候，整个村庄还没有动静。一家人坐在炕上围着一盏豆大的煤油灯，你看我，我看你。吃饺子还太早，只好每人吃上几口刚刚从火把堆里烤好的外焦里热的枣馍和咸豆子。据说，吃这些东西一年之内不会牙疼。看着黑乎乎的天，诚恳地想，只有我们家才真正迎到了喜神。

富有戏剧性的是，有一年爷爷算出的时分是在天亮，太晚了。爷爷根据小黄册子算出来的，应该不会有错。村里人在老善人的引领下完成了祭典活动，我家